

研究論文

# 網絡哀悼的賦權效應：社交媒體哀悼空間的話語實踐與權力博弈

邵鵬、王晟、應恩挺

## 摘要

基於逝者社交媒體的網絡哀悼模式有何基本特徵？其動力機制是甚麼？又具有何種賦權效應或潛力？研究選擇「玫瑰少年」高彥的抖音評論為個案，綜合運用計算機輔助內容分析法和批評性話語分析法，對35萬多條評論文本進行了量化與質化分析。研究發現，在文本內容向度，網絡哀悼可被視作「情緒宣洩式獨白」和「持續聯結式對話」兩種模式的交集，並且持續聯結延伸了情感獨白的核心訴求。在話語實踐向度，持續聯結的話語生成機制在於集體記憶的激活、共同身分的吸引。在社會實踐向度，支持者群體運用「互文性」手段塑造受害者形象，進而逆轉文化和政治上的弱勢。研究進而提出了「網絡哀悼共同體」的概

邵鵬，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興趣：全球傳播、媒介記憶、媒體融合。電郵：ericshaw@zjut.edu.cn

王晟，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媒介記憶、媒體融合。電郵：17816110381@163.com

應恩挺，廈門大學信息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人機交互。電郵：30920211154173@stu.xmu.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23年8月5日。論文接受日期：2024年1月30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念，而網絡哀悼的賦權效應體現在「記憶賦權」和「符號賦權」的雙重維度，促進個體與集體記憶的呼應、交匯，推動情感引力的擴散與凝聚，實現「個體→群體→大眾」層層遞進的廣泛「聯結性」形態，形塑出極具悲情色彩的象徵符號，以此達成一種「社會關係的不朽」。

關鍵詞：網絡哀悼、持續聯結、互聯網賦權、社交媒體、性少數研究

---

Research Article

## **Online Mourning as Empowerment: The Case of “Rose Boy” on Social Media**

Peng SHAO, Sheng WANG, Enting YING

---

### **Abstract**

What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mourning based on the social media of the deceased? What is the driving mechanism behind it? What empowerment effect does it have?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TikTok comments of Gao Yan, who is labeled “Rose Boy,” analyzing more than 350,000 comments using the computer-aide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ext content, online mour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odes, including “emotional and cathartic monologue” and “continuing bonds dialogue.” In addition, “continuing bonds dialogue” extends the core appeal of “emotional and cathartic monologue.” In terms of discourse practice, the mechanism of discourse generation for continuing bonds lies in the activ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attraction of common identity. In terms of social practice, the supporters of sexual minorities use “intertextuality” to shape the victim image and then reverse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weakness. The

---

Peng SHAO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global communication, media memory, media convergence.

Sheng WA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memory, media convergence.

Enting YING (Postgraduate). School of Informatics, Xiam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0 (2024)*

research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community of online mourning,” which reveals that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online mourning is reflected i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emory empowerment” and “symbol empowerment.” Specifically, it promotes the convergence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strengthens the diffusion and cohesion of emotional gravity to realize the extensive “connectedness” form of “individual → group → public.” For affirmative action for sexual minorities in China, online mourning helps the deceased “Rose Boy” achieve a kind of “immort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ceaselessly constructing tragical symbols.

**Keywords:** online mourning, continuing bonds, the empowerment of internet, social media, sexual minor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Shao, P., Wang, S., & Ying, E. (2024). Online mourning as empowerment: The case of “Rose Boy” on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0*, 115–151.

## 致謝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算法傳播的中國本土理論體系建構研究」(23&ZD214)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智媒時代公共健康危機傳播的輿情風險治理研究」(22YJA8600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階段性成果分別在第五屆中國公共傳播論壇、2023年浙江省傳播學年會上宣讀，感謝香港浸會大學黃煜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何晶教授等專家的點評意見。感謝《傳播與社會學刊》編輯老師和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建議。

## 引言

延續生命、對抗死亡是媒介與傳播研究的終極命題。近年來，新興的「生存論媒體」(existential media) 研究試圖引用生存哲學來探討當下「媒介化死亡」、「數字來生」等新的生存問題之間的關聯(章戈浩, 2020)。數字技術和網絡媒介讓Nansen等人(2015, p. 111)描繪的「永不安息的逝者」(the restless dead)成為可能, 逝者以更生動的媒介形式出現, 保持著生前的記憶, 超越了死亡的終結。在此背景下, 對於社交媒體上網絡哀悼的研究越發引人關注。人們通過網絡進行哀悼的行為, 主要體現了哀悼個體表達悲傷、紀念逝者活動中媒介的轉移(Carroll & Landry, 2010), 如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公開哀悼, 以及在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中進行留言與互動。而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則被視作「數字遺產」(digital heritage), 或稱之為「數字遺骸」(digital remains), 從而使得逝者能夠征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甚至跨越生死世界的邊界, 讓「數字永生」成為可能(高嘉遙、蔣璐璐, 2021)。

但是,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在生理學意義上的已逝者所獲得的「數字永生」? 如何看待數字時代的哀悼行為? 如何理解在世者與已逝者通過數字媒介展開的傳播與交互(姜紅等, 2022)? 如何理解公眾對逝者的集體情感, 以及逝者的死亡何以形塑和轉化公眾的悲慟情愫(高嘉遙、蔣璐璐, 2021)? 隨著時間推移, 我們所哀悼的是曾經有著鮮活生命的逝者, 還是作為一個象徵性的符號, 抑或抽象的數字代碼(周裕瓊、張夢園, 2023)? 而在社會行動的維度, 網絡哀悼對於某些少數群體又具有何種賦權效應? 針對這些纏繞著媒介技術哲學薄紗的時代追問, 本研究試圖結合持續聯結理論(continuing bonds theory)與互聯網賦權理論(internet as empowerment), 探析網絡哀悼這一新興話題和中國性少數群體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 語境：社交媒體對中國大陸性少數群體的賦權

社交媒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賦權中國的性少數群體, 為其匿名表達和整合凝聚創造了新機會, 不僅使他們突破話語束縛, 增強公開性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publicity) 和可見性 (visibility)，並且促進中國公眾對於性少數群體的認可度，由此逐漸成為中國性少數群體加強社會行動的可持續方式之一 (Li & Zhang, 2017)。特別是2015年的「秋白事件」，90後中山大學本科生「秋白」因教材存在歧視同性戀內容而狀告教育部，中國性少數群體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和討論這個訴訟案件，這為性少數群體在官方法律框架內爭取權利提供了一種新機制 (Yang, 2019)。而與「秋白事件」相似，「玫瑰少年」議題正體現著社交媒體對於中國性少數者的賦權，由於這個議題涉及校園霸凌、原生家庭、社會歧視、媒體倫理等諸多公共問題，使得中國性少數群體在互聯網空間獲得廣泛關注，並為該群體提供了促進其公開性、可見性的信息傳播基點。

「玫瑰少年」的稱呼來自蔡依林的同名原創歌曲，意味具有女性氣質的男孩，用於紀念台灣性別和性教育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緬懷2000年因性取向歧視和校園霸凌而無辜去世的少年葉永志，並通過諸如「哪朵玫瑰沒有荊棘」、「你是你，或是妳都行」等歌詞，對二元性別框架發起挑戰 (Lin, 2020)。該歌曲不僅入圍了2019年的年度金曲獎，而且被中國大陸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抖音平台上數百萬用戶使用該配樂進行視頻創作。

在中國語境中，「玫瑰少年」顯然已成為因原生家庭、校園霸凌和社會歧視而死的性少數者的象徵符號，與近年來的眾多社會熱點事件相關聯，並不斷凝聚成一種集體記憶。2021年，攝影師鹿道森因原生家庭和抑鬱症而跳海自盡，在新浪微博留下一封遺書〈無需為他立碑，只願玫瑰年年為他盛放〉。同年，17歲的「尋親男孩」劉學州因親生父母的惡意詆毀，以及媒體的歪曲報道，難以承受網絡暴力，同樣在微博上留下一封遺書〈生來即輕，還時亦淨〉後服藥自盡。2022年，視頻網站Bilibili美食區博主「一食紀」發佈視頻遺書〈謝謝，再見〉，訴說因同志身分和原生家庭而帶來的惆悵，隨後被傳出疑似輕生……他們都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被網友們冠以「玫瑰少年」的標籤，持續吸引了眾多哀悼者，或公開紀念，或到他們生前的帳號下留言評論。

公眾關於「玫瑰少年」的悲傷與憤怒情緒在「高彥事件」中達到高潮。2022年9月10日，一位19歲的大學生高彥通過飲酒、服安眠藥、服殺蟲劑自殺。據他生前與朋友的聊天截圖和其同學的口述，高彥的

自殺可能與其大學班主任有關。隨後，高彥的自殺在互聯網上引發了憤怒和激烈的討論，尤其是性少數群體，他們敦促大學澄清他們在事件中的作用；而在中國大陸最主要的音樂平台QQ音樂和網易雲音樂上，《玫瑰少年》原曲和翻唱的評論區前列也被「高彥事件」的相關描述與緬懷話語佔領。然而，由於網絡審查，大部分廣為流傳的帖子都已被刪除，微博「同志之聲」、知名主持人「張大大」在為「高彥事件」發聲後也被禁言(Wei, 2022)。但同時，高彥的抖音帳號(@Birdy)並未被直接關停，眾多人蜂擁而來關注他的抖音帳號，並在他的視頻作品下留言哀悼，形成了一場數字奇觀。截至2023年8月4日，他的帳號粉絲已從原先的10萬上漲至186.6萬，並且視頻留言數量仍在不斷增長。可以說，公眾通過前往高彥抖音帳號留言哀悼，以此書寫記憶、對抗遺忘，既搭建社交媒體的哀悼空間，也連接「玫瑰少年」的平權話語。

總體而言，「玫瑰少年」議題，特別是「高彥事件」，既體現著社交媒體對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賦權效應，又體現了性少數群體的平權行動仍面臨著社會排斥、國家監管等困境。因此，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基於該個案分析，網絡哀悼如何通過情感表達、持續聯結等方式，發揮其對少數群體的賦權效應？社交媒體時代中國少數平權主義者如何進行創新性實踐？又有哪些局限與困境？

## 文獻探討

### 記憶民主化：社交媒體空間中哀悼範式的新轉變

死亡與傳播技術的關係既古老又重要，因為死亡意味著短暫和損失，而傳播技術及其實踐則提供了延續性和恆久性。從哀悼範式的時代變遷來看，媒介不僅是哀悼內容的承載渠道，更影響哀悼的實踐形態與儀式(Bell, 1997)。有學者總結了四種死亡紀念形式：以社區性集體規範主導的「傳統型死亡」紀念；以私密化的死亡與哀悼經驗為特徵的「現代型死亡」紀念；以名人文化、大眾媒體和互聯網結合為新的集體性哀悼；以及當下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代表的「網絡哀悼」，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送葬者，所有人都能聽到敲鐘聲」的時代(Walter et al., 201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在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是公開展示哀悼與紀念的關鍵場所，鼓勵內容的生產與重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哀悼的民主化」(Marwick & Nicole, 2012; Papailias, 2019)。社交媒體情境中哀悼範式變化可以概括為：從私密化到公開化、從在場化到網絡化、從等級化到去中心化。首先，傳統哀悼範圍較小，是一種熟人准入模式，哀悼者局限於鄰居和親友，相對私密化和社區化。但是，數字時代的訃告或死訊一旦發佈於社交媒體上，就從私密走向了公開，所有的哀悼話語都被公開凝視(吳海榮等，2022)。其次，社交媒體打破了哀悼的物理空間限制，不再囿於傳統葬禮和追悼會的在場性，傳統的物理空間禮儀被復刻進網絡空間，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成為牌位的標誌，瀏覽逝者帳號的動態代替了線下掃墓，評論或轉發評論則是悼詞的網絡延伸，由此哀悼儀式和情感得以交織在日常生活之中(Dilmac, 2018)。第三，傳統社會中與逝者關係最親近的人處於等級制度中比較高的位置，被賦予更多表達悲痛的自由，而處於低位者則被認作「無權」哀悼(Stets & Turner, 2006, p. 531)，但社交媒體的技術可供性為陌生網民提供了哀悼的「入場券」，零散的陌生網友被吸引去哀悼逝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先分明的哀悼等級制度。

儘管社交媒體成為公眾集體哀悼(collective mourning)的空間與社區(Bingaman, 2020)，但並非所有公眾人物的去世都能帶來同等集體哀悼。意外性/非預期死亡，比如戰爭大屠殺、自殺、疾病等造成的死亡更容易激發公眾的悲劇性情愴，因為「它有悖於關於生命正常終結的普遍預設——誰應死去，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境之中」(福斯特，2008：3)。回到本研究案例，高彥的死亡是「非自然死亡」範疇，並且他還採取了一系列手段進行自殺，包括服藥、割腕，具備齊澤克(2016：90-92)所謂的「事件性」，即真正的事件的基本屬性就是突然、震撼，這種振聾發聵的震撼和不可挽回的影響就是創傷，事件中的「新」以獨特的、未被接受的、否定性的方式給後世留下長長的陰影。正如網友在社交媒體中表示這種死亡方式很痛苦，是慘烈的、決絕的，這給包括性少數群體在內的中國公眾帶來廣泛的創傷感，因而造成聲勢浩大的網絡輿論。

進而從媒介記憶的維度看，逝者留下的社交媒體帳號成了一個持續開放的留言牆，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分享逝者生前的文字和往事，來自不同視角的私人記憶交織重疊在一起，共同書寫專屬於逝者的「人物誌」，因此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記憶民主化」的實踐 (Walter et al., 2012)。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提供了一個公共哀悼的「界面」(surface) (Carroll & Landry, 2010)，不僅具有「可讀」的公開性，更具有「可寫」的交互性；不僅圍繞個體死亡本身，還形成了圍繞死亡的社會交往空間。由此觀之，這也為在中國語境中屬於敏感話題而遭受抑制的平權行動敞開了新的窗口。我們的分析將顯示：通過逝者社交媒體的網絡哀悼行動，逝者的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進行接合，並衍生出極具悲情色彩的象徵符號。因而，本研究試圖關照這種哀悼方式對於凝聚性少數群體的集體認同感，傳播性少數平權主義思想的影響。

當然，這種網絡哀悼模式存在著爭議，比如網絡哀悼的參與者和內容是否有一定邊界 (許瑩琪、董晨宇, 2019)? 網絡哀悼模式是否因為不夠正式而產生弊端，甚至哀悼者之間會產生嚴重的話語衝突? 鑒於此，本研究所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網友們在哀悼「玫瑰少年」時存在哪些問題，包括時間維度的哀悼週期問題、情感維度的真誠度問題，以及哀悼者之間話語博弈所帶來的倫理問題。

### 網絡哀悼的三重面向：情感表達、持續聯結與賦權效應

早期的網絡哀悼研究聚焦於情感表達層面，認為互聯網為哀悼者的悲傷情緒提供了發聲場所，並在喪親者療癒悲傷心理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形成了一種關注悲傷和支持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框架 (Graham et al., 2013)。Gamba (2018) 指出，數字技術為人們提供了應對悲傷的新工具，讓他們能夠與他人交流自己的經歷，在悲傷的線上社區來分享他們的感受與思考。從博客到社交媒體，用戶創造並尋找空間來講述自我故事和閱讀他人故事，希望以共同的痛苦聯繫起來 (Andersson, 2019)。周葆華和鍾媛 (2021) 則通過李文亮微博評論區的案例，分析了逝者社交媒體中的集體悼念，認為核心特徵是情感表達和流動，由此提出了「延展性情感空間」的概念。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近來的網絡哀悼研究則引入了持續聯結理論，聚焦於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分析生者如何在網絡空間與逝者互動，造成「逝者在網絡空間中也從未逝去」的情景(姜紅等，2022；Kasket, 2012)。Worden (1991) 提出個體哀悼逝者的任務模型：接受失去所愛之人的事實；哀悼與悲慟的過程；適應沒有所愛之人存在的生活；在專注自我生活的同時，尋找保持聯結的方式。鑒於此，Klass等(1996, p. 22)則提出持續聯結理論，認為與逝者保持持續的關係是哀悼過程中建設性的適應行為：「悲傷的解決涉及倖存者與死者保持的持續聯結……這些持續的紐帶可以成為倖存者生活中健康的一部分」。網絡媒介的連接性使持續聯結從私人領域進入到社會公共領域，社交網絡哀悼者將逝者作為社會行動者(Roberts, 2004)，長期的依戀和持續的聯繫可以被保存並被公開看到。逝者生前的數字痕跡可以無限地徘徊在網絡中，哀悼者可以隨時進入某個數字空間直接與逝者說話(Carroll & Landry, 2010)。

在本案例中，「玫瑰少年」高彥在生前就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抖音網紅，帶有獨特的個人形象，他在抖音平台上發佈許多視頻，留下了許多關於他日常生活的數字痕跡，這成為人們紀念和哀悼他的原始記憶或數字墓地，也在事實上為網友們提供了與高彥的對話空間，滿足了網絡哀悼者們寄託情思、保持聯結的需求。後續分析將顯示，社交媒體中網友們對「玫瑰少年」高彥的哀悼不僅存在悲傷或憤怒的情緒宣洩，還有基於自我日常生活的持續聯結。這種持續聯結主要被定義為與死者的「對話」，最基本的特徵是存在著第二人稱稱謂，比如本研究中的「你」、「寶寶」、「彥」(逝者的名字縮寫)等。與此同時，由於信仰體系和文化情境的差異，每個社會都有一套關於哀悼儀式的規範與習俗，會產生多元的聯結形式(Root & Exline, 2014)，所以應在研究中關注不同類型的聯結形式，並根據語義情境進行分析。而本研究案例恰恰體現著文化語境的複雜性，後現代死亡文化與傳統儒家文化、民間網絡社交文化與官方主流文化、西方性少數平權主義文化與中國保守主義文化的相互交纏，為研究社交媒體空間中的網絡哀悼提供了充滿張力的學術想像空間。

此外，學者們也日益關注到網絡哀悼與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的關聯，認為網絡哀悼對於邊緣群體具有賦權效應，通過搭建

哀悼社區，促進群體成員的溝通，幫助合理化悲傷，有助於形塑公眾輿論，建立了集體記憶，進而推動數字領域的行動主義，實現線下的社會運動 (Proust, 2023)。例如，美國黑人人權運動 (Black Lives Matter) 誕生於數字媒介中的集體哀悼，哀悼者們通過對社交媒體的口號建構，凝聚身分認同，喚起公眾對暴力行為的關注，而後突破網絡空間的限制，逐漸轉向線下遊行的社會行動 (Vernon E. Jordan Law Library, 2023)。類似地，本研究的網絡哀悼實踐也可以被視作性少數平權行動，儘管其存在有限性和脆弱性，但需要看到的是網絡哀悼行動所提供的「述行性」(performative)，即在網絡哀悼的過程中，一個個另類的社會網絡被搭建起來，這是社會運動的重要構件 (陸新蕾，2014)。

基於上述分析，既往研究更多地聚焦於網絡哀悼的情感表達、持續聯結，本研究試圖在此基礎上結合互聯網賦權理論，分析網絡哀悼的基本特徵、動力機制與賦權效應。Amichai-Hamburger 等人 (2008) 提出互聯網賦權理論，指出互聯網作為一種賦能技術，允許個人實現一些他們在未接入互聯網前很難做到的事情。而賦權存在兩個層面，包括個體賦權和群體賦權 (Sadan & Churchman, 1997)。Shi 和 Yang (2016) 指出社交媒體賦權來自信息、表達和行動。Penney (2015) 則進一步提出，群體賦權是一個由社交媒體促進的過程，賦權公眾影響同類個體，從而促成更廣泛的公共主張，而這實際上產生了宏觀層面的影響。對標這些思路，網絡哀悼對於少數群體的賦權效應存在兩個向度：其一是「公開性」，指向個體的內容，屬於個體賦權；其二是「可見性」，指向了個體共同參與的過程，屬於群體賦權 (Yang, 2019)，這成為後文討論部分的核心結構。

最後，本研究將高彥的抖音帳號視作他留下的「數字遺產」，將平台用戶的評論視作悼詞與對話，不僅探討「高彥」抖音帳號評論區留言的文本特徵，而且結合事件發展脈絡以及中國網絡生態等語境，嘗試剖析「話語」背後的權力博弈。由於需要考察公眾的哀悼話語背後的社會權力因素，本研究採用 Fairclough (1992) 的批評性話語分析的三維框架，以便更清晰地呈現中國的性少數平權行動是如何通過網絡哀悼實踐達成某種程度的個體賦權和群體賦權，並提出以下五個問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1. 在文本層面，高彥的抖音帳號中的留言在總體上呈現出哪些基本特徵？
2. 作為網絡哀悼社區，高彥的抖音留言區中有哪些持續聯結的現象？
3. 在話語實踐層面，網友與高彥的持續聯結過程中，是如何生產、傳播和消費典型哀悼話語的，其動力機制又是甚麼？
4. 在社會實踐層面，網友們在哀悼「玫瑰少年」的過程中如何逆轉權力劣勢？
5. 具體而言，通過逝者社交媒體帳號進行網絡哀悼體現了何種賦權功能？以及在賦權效應之外還存在哪些潛在困境？

## 研究方法

### 數據獲取與預處理

2022年9月4日，高彥在抖音帳號@Birdy上最後更新了一條題為〈人來人往，你一定要記住我〉的圖文短視頻，將主頁簽名改成「不要想我哦」，被視作與網友公開告別的遺書。在高彥自殺後，其父母通過其抖音帳號發佈他去世的消息，並且在各大網絡平台中迅速擴散。但是研究選擇了高彥抖音主頁中評論量排名前十的作品，而並非其離世前的最後一條作品，一是因為單條視頻的數據量相對不足，不能充分體現評論熱度；二是因為前十的作品覆蓋面更廣，不僅有傷感式、搞笑型的圖文與視頻，還有他參加春晚演出和其他更日常的影像。本研究通過Python編程技術，爬取了2022年9月18日至2022年12月7日間的抖音評論文本，時間跨度為81週，共計425,664條文本，剔除僅提及(@)其他用戶而沒有表意的文本後，最終為355,281條文本。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社會注意力的轉移，並且官方尚未公布調查結果，高彥的抖音評論文本趨於平緩，截至本研究結束時仍未有明確變化，因而未將分析文本的時間線繼續拉長。

## 基於大數據挖掘的主題模型方法

為了更準確地分析龐大的文本內容，研究採用無監督算法的結構主題模型 (structural topic models, STM) (Roberts et al., 2014)，對評論文本進行主題挖掘。與傳統的內容分析方法不同，STM採用歸納的方法識別模式和主題，不是基於預先定義的框架分類，而是從文本的詞語網絡分佈中生成不同主題，再進行解釋性檢驗，可以降低研究的主觀性。目前，STM已被廣泛運用於政治學和語言學領域的文本分析 (Kuhn, 2018; Lucas et al., 2015; Rothschild et al., 2019)。首先根據代碼運行結果，最終測算出最佳聚類為25種，並提取25個聚類的主題關鍵詞，再結合各個細分主題的網絡關係，通過關鍵詞檢索進行人工研判，將相近的主題歸為同類，最終得出九個大類 (見表一)：(1) 正義訴求、(2) 憤怒譴責、(3) 悲傷哀悼、(4) 譴責刪除、(5) 性別平等、(6) 日常問候、(7) 告知資訊、(8) 新的關係、(9) 其他內容。

Kasket (2012) 在Facebook上的網絡哀悼研究中發現，人們對逝者的稱呼用「你」而不是用「他/她」，這種持續聯結有明確的溝通對象。循此，本研究將悲傷哀悼、憤怒譴責、正義訴求、譴責刪除歸為公眾的悲傷表達與公共紀念，主要是哀傷、憤怒等情感宣洩。而根據持續聯結的特徵，本研究將性別平等、日常問候、告知資訊、新的關係同歸於持續聯結主題，因為這些主題都有明確的主體間性的對話特徵，指向了逝者「你」。簡言之，主題1至4屬於情感宣洩範疇，主題5至8屬於持續聯結範疇。當然，這兩個主題之間也存在一定聯繫，並不是互相獨立的，這個問題將會在後續分析中得到展現和解釋。

## 批評性話語分析法

批評性話語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是一種從語言學角度對語言進行社會分析的方法，其理論基礎源自馬克思主義。CDA的主要目的在於揭示語言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尤其重視人們習以為常的偏見、歧視、不公正、不平等、權力關係等在實施、隱藏、自然化、合法化、再生產時的話語過程 (熊偉, 2011)。目前，學術界公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Fairclough (1992) 的「社會文化分析法」在整個CDA領域中是最具系統和完善的。社會文化分析法認為，語言的使用實則為一種社會實踐，而所有的社會實踐都會受制於社會以及社會文化語境。因此，話語或任何一個話語實踐都應該是一個包含語言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的三維框架統一體。基於此，Fairclough (1992) 提出，批評性話語分析應該遵循三個步驟：描述 (description) → 闡釋 (interpretation) → 解釋 (explanation)，即描述文本的各種語言形式特徵，闡釋文本的生成過程，解釋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本研究的內容分析過程對標該三維分析框架，以形成對文本特徵、話語實踐、社會權力博弈的綜合關照。

表一 高彥抖音帳號評論區留言的主題分類及關鍵詞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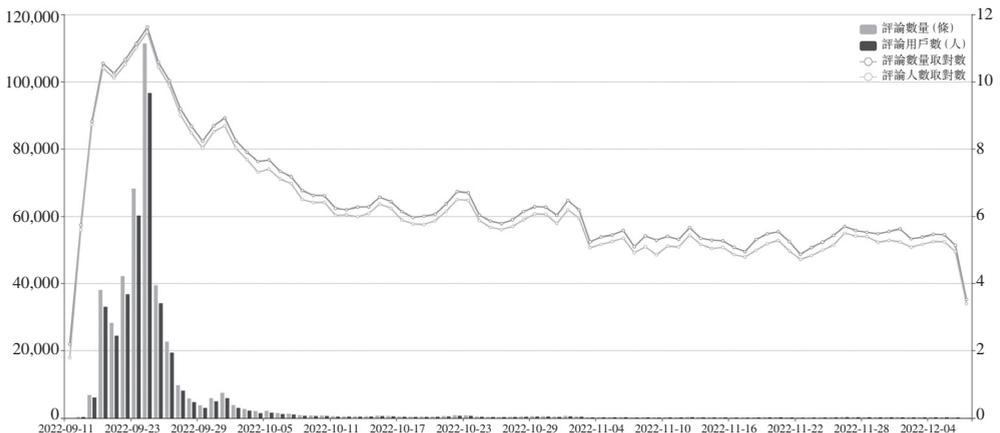
序號	主題名稱	關鍵詞
主題1	正義訴求 (19.75%)	t1：壞人、懲罰、歧視、解釋、生命、傷害、報警、力量、證據、合法 t6：支持、調查、加油、外省、頂頂頂、建議 t7：正義、公道、永遠、缺席、嚴懲、遲到、惡有惡報 t11：交代、家長、疏而不漏、法網恢恢 t14：熱度、評論、受害者、公正處理、處罰、頂上去 t23：說法、堅強、惡人、真相、放心、答案、報應、介入
主題2	憤怒譴責 (4.23%)	t3：老師、學校、不配、山東、學生、為人師表、生氣 t9：發聲、男孩子、走了、去世、起訴、道歉、好慘、滾出去、wc、人為 t20：可憐、不該、噁心、師德、凋零、一生、少年、壞、公理 t17：公平、性取向、資本、打壓、戰勝、長期、侮辱、欺壓、統招生 t18：孩子、父母、傷心、痛苦、兒子、黑髮人、可惡、丟下、親人、農民
主題3	悲傷哀悼 (16.73%)	t2：希望、安息、公正、加害者、處理結果、懲罰、自由、所願 t10：難受、離開、舞蹈、跳舞、溫柔、淚、諛 t15：下輩子、一路走好、抱歉、開開心心、天堂、遺憾、安好 t16：難過、哭、嗚嗚、好帥、死、崩、emo、哭死了、心酸 t19：可惜、心疼、心痛、無助、討回公道、痛心、好氣、冤
主題4	譴責刪除 (0.85%)	t12：陽光、受不了、好看、可愛、刪、再也、被刪
主題5	性別平等 (21.11%)	t8：玫瑰、少年、綻放、盛開、松柏、鋪滿、長成、鮮花、向陽、天空、帶刺 t22：喜歡、男生、錯、女生、愛情、不分性別、側柏
主題6	日常問候 (11.52%)	t4：過年、沒想到、讚、很早、不在了、讚過、家、合影、好羨慕、警察、隔壁 t5：世界、快樂、晚安、好想你、國慶、阿彥、弟弟、天天、再見、聲音
主題7	告知資訊 (5.61%)	t13：乖乖、河北、春晚、梅花、不想、哥哥、下雪、拍、兆頭、回家、太苦、四川、大雪、明年、更新、歌、衣服、送行

序號	主題名稱	關鍵詞
主題8	新的關係 (12.44%)	t21: 好好、回來、照顧、生活、疼、活著、吃飯、笨蛋、休息、傻瓜、傻子 t24: 男孩、平安、美好、寶寶、多好、未來、選擇、光明、喜樂、帶你去 t25: 開心、幸福、保護、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勇敢、小孩、而活
主題9	其他內容 (7.76%)	劉學州、人才、生日、第一次、天冷、別哭、不住、本質、小夥子、釋懷、星星、輪、邪惡、普高、璀璨、祖國、良心、摧殘、肆意……

## 分析與發現

總體來看，高彥抖音評論區的哀悼文本呈現出「瞬間爆發，快速消退」的特徵（見圖一）。高彥抖音帳號的評論區作為網絡哀悼社區，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公眾前來哀悼，在其逝世三個月間共有34萬多用戶留下超過42萬條評論。從總體數量來看，線上哀悼的熱度相對高漲，平均每天有3,800位用戶留下4,730條評論。但從時間線上來看，評論文本自2022年9月20日（ $n = 38,064$ ）開始猛烈增長，於2022年9月24日（ $n = 111,410$ ）達到線上哀悼的最高潮，而後開始驟降，並在10月8日（ $n = 868$ ）之後始終低於一千，處於平穩的沉寂狀態。最直觀的原因是，9月24日，《新黃河》稱山東省委教育工委已組建由教育、公安等部門已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進駐X大學<sup>1</sup>開展調查，許多公眾認為這一事件終於得到了官方回應，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公眾的憤怒情緒，轉變為「等待結果」的理性態度，因而減少了對「高彥事件」的公開發聲和哀悼。

圖一 高彥抖音評論區的留言數量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文本內容向度：情感宣洩式的獨白 vs. 持續聯結式的對話

### I. 情感宣洩式的獨白：悲傷哀悼與憤怒譴責

對全量評論文本進行清洗，去除「@用戶暱稱」、表情符號、停用詞及「高彥」、「彥」、「阿彥」等高頻的基礎稱呼詞，隨後進行詞頻統計發現(見圖二)：詞頻最高的十個詞語依次為「希望」( $n = 36,237$ )、「熱度」( $n = 32,597$ )、「評論」( $n = 21,858$ )、「支持」( $n = 21,646$ )、「增加」( $n = 20,879$ )、「調查」( $n = 19,284$ )、「老師」( $n = 17,999$ )、「加油」( $n = 16,786$ )、「正義」( $n = 15,841$ )和「好好」( $n = 14,886$ )。文本檢索後發現，由於官方沉默與刪帖行為，關注此事的公眾紛紛來高彥評論區留言，希望通過評論增加視頻熱度，讓更多人看到，最典型的表述為：「此評論僅用於增加熱度。我相信正義不會缺席」、「不要讓熱度下去！支持跨省調查！」，因而「熱度」、「評論」、「支持」、「增加」、「調查」、「正義」均位列高頻詞前十名。這些高頻詞基本屬於「正義訴求」，而「正義訴求」主題佔比19.75%，位居所有可歸納主題的第二名，在客觀上也支持了本研究的分類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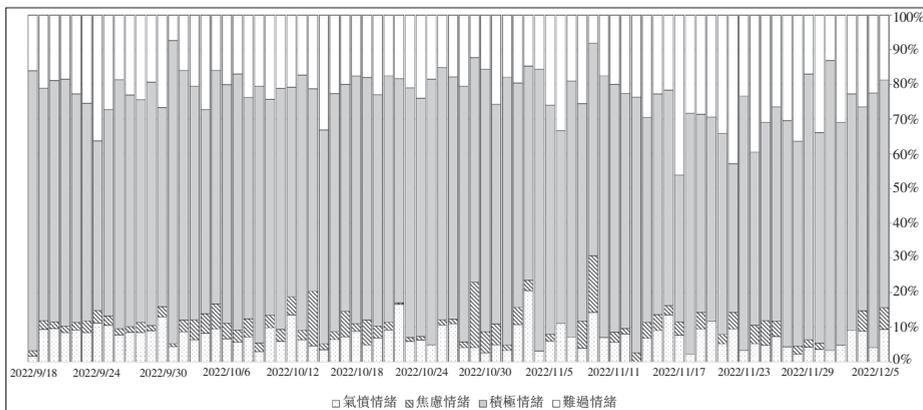
僅從表情包來看，悲傷情緒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流淚」表情共有398,160次，泣不成聲表情共出現65,868次，穩居前二；其後的表情包頻率則斷崖式下跌(見圖三)。尬笑( $n = 15,707$ )則表示鄙夷、無語的意思，存在兩種面向，一是不相信玫瑰少年高彥的生命就此終結，是一種聊以自慰式的調侃，例如「下輩子不要來X大學了(尬笑)」；二是對學校處置的不滿，要求追責曾對高彥進行性取向攻擊的老師，例如「給個解釋啊@X大學，幹嘛呢(尬笑)你看不見嗎？」。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與其他平台比如Facebook、新浪微博不同，抖音平台沒有蠟燭表情符號，而在中文語境中，玫瑰也同樣具有祭奠逝者的象徵，例如「一路走好(泣不成聲)(玫瑰)」、「換個世界繼續跳舞啦(玫瑰)」；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高彥的經歷與「玫瑰少年」相吻合，公眾調用集體記憶進行訴說，並認為男孩也能像玫瑰一樣擁有女性氣質，希望玫瑰少年獲得社會包容，例如「玫瑰少年(泣不成聲)以後要天天開心」、「(玫瑰)(玫瑰)(玫瑰)正義永遠不會缺席，加油」。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圖四 不同情緒的評論文本數量在一年中的變化情況



最初是表達高彥死亡解脫後升至天堂的希望(例如「天堂」、「加油」、「希望」)，後續則變為親切的稱謂與慣常的問候(例如「寶貝」、「晚安」、「早上好」)。與哀悼李文亮案例研究不同的是，難過情緒自始至終都未能成為主導情緒，整體情緒變化趨勢相同，並未從消極的悲傷情緒轉化為積極的情緒。這種網絡哀悼從一開始就是積極的取向，的確夾雜著些許悲傷、憤怒，但情感基調是衷心的喜愛與祝願，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視死如生」的中國特色生死觀。正如學者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一直帶有禁忌性質，中國哲學鮮見關於死亡的討論，普通民眾也傾向於避之不談(Chan, 2012)，即便在所謂的「壯觀的死亡」(Spectacular Death)時代(Jacobsen, 2016)，網友們也傾向於將死亡美化為「重生」。

與哀悼李文亮的研究相似，「玫瑰少年」的社交媒體帳號同樣是一種「延展性情感空間」(周葆華、鍾媛, 2021)，公眾不僅僅借此表達哀悼與祝願，還試圖通過日常問候、分享生活等方式與死者展開對話，從而實現與死者的持續聯結。並且，持續聯結主題的文本佔比高達50.68%，超過情緒宣洩主題(39.56%)。關鍵詞貢獻網絡(見圖五)演示了不同主題群中最核心的話語表達。主題1的核心關鍵詞為「熱度、調查」；主題2的核心關鍵詞為「希望、安息」；主題3的核心關鍵詞為「老師、學校」；主題4的核心關鍵詞為「陽光、受不了」；主題5的核心關鍵詞為「玫瑰、少年」；主題6的核心關鍵詞為「世界、快樂、好想你」；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又是群體成員可以獲取並挪用的，它是一種具有選擇性的社會表徵，承載著對一個社會群體重要的認同 (Jovchelovitch, 2012)。

網友們的哀悼話語實踐呈現出明顯的互文性特徵，他們通過摘錄、凝縮、擴展和補充其他來源的文本，比如同性電影台詞、其他「玫瑰少年」的網絡遺言、名人名言等，這不僅豐富了社交媒體哀悼的敘事形式和文本主題，還擴散了傳播主體的價值判斷。網絡哀悼者不斷調用「玫瑰少年」的集體記憶，並且試圖突破相對狹隘的性取向歧視問題，將焦點轉向學校教育、社會公平議題，升華為「對抗一切不公平的現象」。一方面，在高彥的抖音評論區中，「玫瑰少年」( $n = 5,168$ )、「願玫瑰年年為你盛開」( $n = 2,551$ )等類似表述出現的頻次極高，甚至匯入了同性主題的電影記憶，比如人們援引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主人公說的台詞：「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路衝過去」，來論證中國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普遍禁忌，凸顯高彥自殺的無奈與勇敢。另一方面，網友們並不局限於同性議題，為了擴大受眾範圍，將學校教育、社會公平議題納入哀悼話語的生產邏輯中，以期喚醒普通公眾的共情。例如，留言引用中國著名作家魯迅的名言：「今日我若冷眼旁觀，他日則無人為我吶喊」( $n = 164$ )，認為所有人都可能會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要與一切歧視作鬥爭，呼籲構建一個包容、多元的社會。

## II. 基於共同經歷，凝聚身分認同

如表二所示，通過進一步分析文本內容發現，線上哀悼陌生人的另一個重要動因是身分認同，這包括了兩個層面。其一，由於本案例的特殊性，涉及性少數群體議題，吸引了同性群體，他們聚集於此，表達憤怒和悲傷的同時，還會自我標榜「我也一樣」，傾訴自己的不公平遭遇。其二，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每個人都會經歷親人離世的悲傷遭遇。當高彥事件熱度猛增，他的「自殺式死亡」勾起了哀悼者的創傷心理，以同樣的喪親者身分前來哀悼，並且假設高彥與他們已逝的至親好友同在某一個空間（尤其是天堂，或者隱晦的「那邊」），想像他們能夠相遇並產生「新的聯繫」。高彥的抖音評論區就像日本的「風之電話亭」(卡斯凱特，2020)，許多人來到這裏，與已逝的親人掛上一個永遠

不會有人接通的電話，用這種方式和思念的人說說平日無處傾訴的心裏話，也問出心中的疑惑。概言之，由於對逝者的共情心理，零散的網民不斷匯聚、紀念逝者、傾訴情感，將真實的生活感受接入虛擬場景，這種網絡哀悼看似是網友個體的激情爆發，實則是對群體號召力的回應，以情感反饋參與數字記憶實踐。

表二 兩種表達身分認同類型的典型文本

同性取向	(1) 我也是一個愛跳舞的男生，和你也一樣，我知道我有一天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高彥，你在那美麗的地方好好地綻放，儘管我們素不相識，但是我會替著你繼續面對世俗，努力生活，不留遺憾，加油！
	(2) 我曾經也以為學校是一個包容的地方，但是有一天學校通知我的母親，因為我是同性戀所以要開除我，我覺得很不可思議，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年代，還有這樣的輔導員，這樣的校領導。
	(3) 高彥，你在那應該會遇到我的姐姐吧，可以跟她說我想她了嗎？我和她都是女孩子，我和她相愛，我們說好了以後有個家，我們等合法結婚，但是她生病去世了，我好痛苦啊，我想去陪她了，沒有她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活。
親友離世	(1) 寶寶，看到這個哥哥就拉緊哥哥的手，是媽媽對不起你，是你來的時間不對，多陪哥哥說說話，哥哥會教你跳舞，把媽媽夢裏給你講的故事都講給哥哥聽，一定要拉緊哥哥的手，哪天媽媽撐不住了就來找你們。
	(2) 高彥，去找我的好朋友，她叫劉慧婷，一個和你一樣很陽光樂觀善良的小孩，她在6.1號的時候去世了，離開連一聲告別都沒有，她才19歲很漂亮，特別愛美喜歡運動，希望你能夠陪陪她，和她成為好朋友，告訴她我好想她。
	(3) 高彥，你遇見一對夫妻，一個胖一點兒的老婆婆和一個瘦瘦的乾乾巴巴的老爺爺，婆婆她頭髮花白紮著一個小辮，見到他們可以嘗嘗我老爺爺做的糖丸子，那是我吃過的最最最好吃的丸子。

## 社會實踐向度：持續聯結式哀悼中的觀念衝突與抗爭策略

話語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孕育於特定的社會語境之中，是對社會現實的鏡像反映(蔡騏、趙嘉悅，2022)。據前文所述，在該社交媒體哀悼空間中，哀悼話語的情感呈現出高度一致性，以「正義訴求」為主基調，明確指向於悲傷哀悼與憤怒譴責，哀悼話語中對性少數平權的認同度與支持度相對較高。那麼，為何支持的聲音更具優勢？其如何與傳統價值觀展開博弈？這體現出何種性少數平權主義的社會實踐？對此，需要回歸至中國當代的社會文化與政治語境進行考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I. 逆轉文化劣勢：挪用民間喪葬觀念，強調師德師風問題

並非所有的死亡都能夠被公開承認、得到社會的認可、在眾人之間傳播，這一現象被稱作「被剝奪的悲傷」(disenfranchized grief) (Doka, 1999)。由於網絡哀悼者們的價值觀念往往存在一定差異，逝者的社交媒體像是一個充滿衝突的墓地。在高彥的評論區，圍繞自殺、抑鬱症的不同觀念也呈現出衝突的張力，認為「自殺是不負責任、自作自受的行為」的觀點與認為「自殺是悲慘的、有深刻社會原因」的觀點展開拉鋸。少數網民援引基督教原教義中「同性戀是罪惡的」、「死後靈魂無法升入天堂」等話語來反駁支持性少數平權的哀悼者，另外一些則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開薪悅、姜紅，2019)，不推崇自殺，認為自殺是一種不負責任，違反孝道的行為。

對此，支持平權主義的哀悼者們通過「死者為大」的民間傳統觀念佔據道德高地，並通過重點強調事件的本質是師德師風問題，突破關於自殺、同性戀的文化爭論(見表三)。一方面，支持性別平權的哀悼者們還借助中國民間「死者為大」的傳統觀念進行反駁，著重塑造高彥的「受害者」形象，認為「人都被逼死了，還要怎麼樣」、「這還能有甚麼反轉？人都死了還怎麼反轉」。換言之，在中國傳統喪葬文化中，推崇適當地放下生前恩怨，以「死者為大」甚至是村莊最基本的禁忌(李平菊，2021)，而作為陌生人的網絡哀悼者在與逝者毫無恩怨的情況下，對逝者抱以歧視態度被視作「不合時宜」，進行言語污蔑更是被視為「違背良知」。另一方面，支持平權主義的哀悼者們首先強調高彥是因為受到老師歧視而死，該事件的最大重點在於師德師風問題，而不只是因為性取向歧視。他們意識到，中國主流輿論對於同性戀主題較為敏感，想要獲得官方認可與支持，就必須盡力遮蓋性別平權色彩，轉而以官方重視的教育問題作為切入口。例如，「現在輿論對他很不利，應該重點說老師和學校對他的不公、長期打壓，性取向這個事孩子也沒有強調，主要是學業上的問題，現在三胎政策，性取向為主導的話難以上热搜」，類似文本達7,726條。如此，高彥社交媒體帳號的哀悼空間中，支持平權主義的哀悼者們消解了與主流文化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將哀悼話語引入公共議題，逆轉了在現實中所處的文化劣勢。

表三 性少數平權主義的反對者和支持者之間話語衝突的典型文本示例

反對者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 自殺違反儒家孝道	(1) 上帝可不喜歡同性戀。
	(2) 你查查天堂這個概念所屬的宗教對 gay 的看法。
	(3) 同性戀嗎，真夠惡臭的，不能因為死了就不歧視，吐了。
	(4) 父母供著他上學，用著 iPhone，穿著潮牌，一受點打擊就自殺，不但是對自己的不負責，更是對不起他父母，還有甚麼好冤枉的？同性戀對得起父母嗎？
支持者 事件本質為師德問題 死者為大的文化傳統	(1) 這件事的本質根本不是性取向的問題，而是學校老師長期的 PUA、辱罵、不公平導致高彥去世，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2) 此評論用於增加熱度，性取向只是學校轉移輿論的矛頭，希望大家把重點放在他被老師長期的打壓、辱罵偏見、不公平對待，才是他選擇結束自己的原因。
	(3) 給自己積點德吧，本來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就很難過，估計看見你這條評論更加難過了，死者為大。
	(4) 你沒覺得在我的悼念評論下面說這話不合適嗎，沒學過要尊重逝者嗎？

## II. 逆轉政治劣勢：樹立擁護官方立場，宣揚對抗資本壓迫

如果說上述文化維度的網絡哀悼實踐是不同公眾間價值觀念的衝突，那麼如何規避政治敏感性，則是更為重要的、無法繞開的現實難題。伴隨冷戰心態的復蘇和全球民族主義的加劇，中國性少數群體面臨著被指控為「西方勢力」或「敵對勢力」的政治風險 (Ren & Gui, 2022)，國家對性少數群體相關的數字媒體平台的監管日益嚴格 (Miao & Chan, 2023)。在此背景下，性少數群體不得不做到「有創意的、聰明的、靈活的、敏捷的」，從而能夠遊走於政府所規定的允許與不允許的中間地帶 (Rofel, 2012)，性少數平權行動也需要通過策略性調整以獲取政治合法性。研究中的網絡哀悼者們通過向主流媒體求助、宣揚對抗資本壓迫來獲得政治合法性，逆轉性少數群體的政治劣勢。在政治立場的原則問題上，網絡哀悼實踐中體現了對黨、國家、權威媒體的明確信賴，期待官方伸張正義，督促事件調查，其中有表明擁護「黨和國家」的文本 ( $n = 1,339$ )、「@人民日報」的文本 ( $n = 2,471$ )、「@央視新聞」的文本 ( $n = 1,275$ )。

與此同時，平權主義支持者們強調傳統資本主義和平台資本主義對普通公眾的極大壓迫，體現為一種相對溫和而具有策略性的「弱者傳播」實踐。在現實世界，強者總是少數，弱者總是多數。因此面對著強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弱衝突，輿論主體通常認同與己相同的弱者，這促成了輿論的弱者傳播定律，也促成了強者在輿論世界的不被認同(鄒振東，2018；曾慶香，2021)。而在網絡哀悼過程中，平權主義支持者們傾向於塑造「無力的底層」，並將為該事件發聲和性少數群體維權視作「對抗強大的資本主義」，其中與「資本」、「資本主義」、「資本家」相關的表述達7,456條，展現高彥家屬和底層群眾無能為力的相關文本達5,554條。

具體來看，平權主義支持者們一是強調高彥是平民階層、普通學生的弱者形象，溫和善良卻命如草芥。例如，「平民百姓真的很無力」、「資本打壓青年」。二是控訴平台是資本主義的冰冷產物，是作為掌握話語權力的強者，譴責平台通過壓熱搜、刪帖、刪評論等方式進行輿論監管，將「資本的力量」、「資本的世界」視作當下維權困難的原罪。例如，有哀悼者指出「為你發聲的人不是被封號就是被下架視頻了，你能看見這世間的種種不平等嗎，願少年終將能戰勝資本」、「抖音真是甚麼髒活都接啊，一直壓熱搜」，塑造平台為了資本獲利而限制公眾發聲。諸如此類文本，著重刻劃遭受資本圍堵與壓迫的「無力的底層」形象。

總體來看，平權主義支持者們以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遭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底層階級的雙重身分，獲得為該事件發聲的政治合法性，鞏固自身關於性少數議題的價值觀念，從而完成政治權力的逆轉，令「現實中的強者」成為社交媒體哀悼空間的「輿論弱者」。正如網絡哀悼者指出「我們都不是有權有勢的家庭，我們可能是高彥，以後也可能是高彥的父母，那種無力抗爭感，將心比心，作為局外人只為以後給自己留一點希望，可怕的資本，都不是一個人人在戰鬥」，體現著弱者對弱者的惺惺相惜，以一種溫和的「底層表達」(何晶，2021)實現有限度的政治抗爭，增強了中國性少數平權行動的走向「再政治化」的可能性。

## 討論

通過計算傳播分析和話語分析，本研究描繪了社交媒體哀悼空間中異質性群體的話語實踐及權力博弈，這為社交媒體賦權理論提供更進一步的論證和思考。根據社交媒體賦權理論的雙重框架，「玫瑰少年」的

社交媒體帳號在個體賦權層面，延續了「玫瑰少年」們自身的個體記憶，並促進了性少數者在信息、表達和行動維度的公開性能力。在群體賦權層面，「玫瑰少年」的社交媒體帳號為公眾提供了一個交互空間，成為了公眾討論性少數平權問題的基點，並且通過這種哀悼方式實現情感共鳴，將社交媒體中散落的性少數群體成員以及外部人士都整合到了這個虛擬空間，而這種自發式的整合效應在沒有社交媒體時期則是難以實現的。總體而言，本研究揭示了一種「網絡哀悼共同體」的現象及特點，網絡哀悼具備「記憶賦權」和「符號賦權」的雙重效能。在這個概念中，社交媒體賦權效應著重體現在「社交可供性」層面，即可致意、可傳情、可連接、可協調的功能（潘忠黨、劉於思，2017），通過情感引力的擴散與凝聚實現「個體 → 群體 → 大眾」層層遞進的廣泛「聯結性」形態，通過「象徵哀悼」強化「玫瑰少年」這一中國性少數平權行動的代表性符號，但也存在文化觀念的衝突情況，值得進一步反思。

### 記憶賦權：基於社交媒體「聯結性」的「關係生命」

社交媒體帳號保存了逝者的個體記憶，即其曾經分享的個人形象和生活故事，並允許網友共同悼念，正是在這種「延展性情感空間」中，網友們不斷注入新的記憶文本，將個體帳號拓展為可供集體記憶書寫的虛擬場域，由此生成強烈而複雜的「情感記憶」，在此過程中延伸了逝者的生命價值。一方面，社交媒體是一種「情動媒介」（*affective medium*）（周裕瓊、張夢園，2022），網絡哀悼形成了以逝者為中心的公共交往場域，在「死者為大」的中國傳統觀念框架下，傾向於情感宣洩的獨白構建了一個「數字共同體」。由於與死者的某些共性，比如性取向相同、遭受過校園霸凌、遭遇過品德不佳的老師、經歷過親友離世的悲痛等等，彼此陌生的網友共同聚集於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既是在表達對「玫瑰少年」事件的悲憤情緒，也是在紓解自身經歷的創傷心理。另一方面，隨著時間推演，日常問候、節日祝福、傾訴心事及網友互動逐漸增多，這種傾向於持續聯結的對話溝通代表著「逝者不會真正地死去，而是永遠停留在一個對話的邊緣數字狀態」（Kern et al., 2013）。同時，與已逝的「玫瑰少年」的持續聯結又具有衝突性，網絡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悼還存在著生者與生者之間的矛盾與博弈，顯著區別於傳統哀悼的固定儀式與規範。

上述現象可以視作「網絡哀悼的記憶賦權效應」，但不僅僅是停留於數字媒介對記憶的存儲功能，也並不只是社交媒體記憶的「級聯效應」(cascading effect) (García-Gavilanes et al., 2017)，而是在深層維度的「關係賦權」。喻國明和馬慧(2016)認為，「關係賦權」是數字時代的資源分配與權力賦予新機制，應被視為新媒體賦權研究的核心；特別針對於互聯網群體傳播現象，涉及的是圍繞熱點事件產生的臨時性關係。而通過網絡哀悼實現「數字永生」，實際上是基於社交媒體的「聯結性」而達成「社會關係的不朽」，生成了一種新的「關係生命」(姜紅等，2022)。換言之，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作為數字記憶的價值，具有「技術精神性」(techno-spirituality)，是社交共享與協作式行動功能的新型媒介形式，而非毫無生機的數據 (Stolow, 2013)。Sumiala (2018) 將不朽視作一種流動的、與媒介密切相關的實踐，網絡化社交賦予公眾人物死後的超越平凡人的不朽，同時哀悼者們也創造了一種歸屬感與團結感。正如本研究發現的那樣，來高彥抖音帳號評論區中哀悼的性少數者在宣洩悲傷、憤怒情緒之外，還訴說著自身經歷和生存現狀，通過這一過程強化了自我的身分認同，並進一步促進性少數群體的團結感。

進而言之，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 從生存主義媒介的視角認為，現代媒體的生存事實在於我們可以輕鬆地與死者的可資傳播的痕跡交融在一起。在當下的技術支撐下(文字、圖像、視頻)，逝者實際上是以一種多媒介的方式存在於網上，或者說是數字生態之中 (Theall, 2001)。在理論意義上，這項網絡哀悼研究恰恰說明了自我是處於持續聯繫 (constant connectivity) 之中的，與死者進行交流是將「自我」傳遞給無處不在的「超連結流」(streams of hyperconnectivity) (Lagerkvist, 2017)。在了解高彥的個人故事的過程中，性少數平權主義的支持者們在他的帳號中聚集起來，嘗試與「高彥」對話交流，並由此展開對於性取向歧視、校園霸凌等問題的公共討論，重申和傳播自我關於性取向問題的價值觀念。比如，他們用比喻等手法進行抒情，「愛不分性別，玫瑰不需要長成松柏，性別不是邊界，偏見才是」，在哀悼中強調和傳播平權主義思想。

## 符號賦權：基於「象徵哀悼」的性少數平權行動

如果說網絡哀悼的記憶賦權是基於逝者的「關係生命」，對應著個體賦權維度，那麼網絡哀悼的符號賦權效應則對應著群體賦權維度，圍繞逝者社交媒體的記憶書寫與關係存續是零散的、綿長的，而符號賦權則更加凝練和聚焦，這為中國的性別平權行動提供新的經驗思考。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儘管政府對社交媒體的監管日益嚴格，但相對於線下集會和遊行而言，社交媒體的監管是相對寬鬆的。本案例揭示了這種社交媒體哀悼空間提供了另一個隱藏的契機，也反映了官方對於性少數平權行動有一定的容忍程度。因為時至今日，技術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幫助我們和逝者取得聯繫的媒介，逝者就存在於技術之中（卡斯凱特，2020），「玫瑰少年」們留下的帳號將成為永恆的數字墓碑，是一種立體豐富、且不斷更新的數字記憶源泉，或將成為性少數平權行動的重要集散地，這也是中國性少數群體加強社會行動的可持續方式之一。此外，社交媒體賦權「玫瑰少年」們製造出一場場「壯觀的死亡」，特殊的死亡方式極大地增強了性少數議題的「中介化可見性」。由此，社交媒體的網絡哀悼功能將性少數群體和外部人士整合到了一個虛擬世界之中，基於他們對「高彥事件」以及這背後複雜的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注，共同形塑了「玫瑰少年」這一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象徵符號。

儘管本研究無法準確地檢驗（預測）社交媒體的網絡哀悼功能對於現實社會變革的影響程度，但在歷史上，對「不合理的死亡」（unjustifiable death）的悲憤有可能將哀悼者聚集在一起，積極爭取公民權利，推動社會變革（Holst-Warhaft, 2000），而社交媒體不僅可以公開那些不知名的人的死亡，而且增強了這種潛力。比如，2010年美國青年切西爾金被謀殺，吸引了巨大的社交媒體關注。同樣地，社交媒體公開了本不知名的「玫瑰少年」們的悲慘遭遇，推動了公眾參與「象徵哀悼」。「象徵哀悼」指的是與死者交集甚少，甚至毫無交集的人，儘管對逝者本身的情感較為淡薄，但是對逝者外化形成的某種象徵想像產生共情。這種形式廣泛地存在於互聯網哀悼之中。哀悼者與逝者本身交集較少，其悲痛主要源於依託意義的本體不再存在（吳海榮等，2022）。互聯網中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於著名科學家、體育人物、明星等群體的廣泛哀悼便是這一哀悼形式的具體體現。在這個意義上，通過網絡哀悼，那些跟高彥一樣的、因社會歧視和校園霸凌等原因而自殺的性少數者都可能會被轉化為「玫瑰少年」的符號，因為這個符號越來越令人熟知，也更能夠直接引起性少數群體的共鳴。正如網絡哀悼者在與高彥持續聯結時，描繪「玫瑰少年們」在天堂相聚的美好生活情景：「高彥，帶著劉學州和鹿道森一起去找一食紀吧，一食紀會給你們做好吃的飯，你跳舞給他們看，鹿道森給你們拍好看的照片，記得一起保護劉學州哦，他有點笨笨的」，這並非簡單的網絡圍觀，也並非淺嘗輒止的公眾討論，而是對於核心符號的想像和意義再生產。

本質來看，逝者在網絡空間的網絡身分依舊存在，不僅僅是簡單地保留了線上帳號，而是記錄逝者生前的視頻音頻等媒體與哀悼者之間進行的「準社會互動」(Chung & Cho, 2017)，即在媒介接觸過程中產生的幻覺體驗，就好像真與媒體人物之間存在互動關係。這種準社會互動產生的最終結果就是——逝者被不斷符號化，通過媒體受眾建立起逝者的象徵意義，遠方逝者象徵的品格與苦難成為哀悼者的情感引力。本研究案例中，「玫瑰少年」高彥本身具有優秀的個人品格，他成績優秀，獲得某高校舞蹈表演的河北省校考第一名，拿過「荷花獎」，還曾登上過中國最高規格的春晚舞台，但卻因性取向歧視而遭受不公平對待，矛盾的經歷成為高彥「弱者形象」的基礎，也直接為網友們提供了一個較為固定的哀悼腳本，即「一個優秀學生因遭受歧視而死」。由此，性少數、優秀學生的雙重標籤被轉化為「弱勢群體」，成功激發了性少數群體及外部人士的情感共鳴，形成龐大的情感向心力，他們在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上留言，展開獨白或對話，不斷將特定的個體記憶同「玫瑰少年」的集體記憶關聯在一起，最終匯入中國性少數平權行動的符號資源庫。

網絡哀悼的「有限式賦權」：「一次性參與」和「道德辯論賽」

由於網絡哀悼的虛擬性，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對性少數平權行動的促進能力存在兩個局限：

其一，注意力稀缺決定了網絡哀悼中「情感過客」的常態，悼念文本隨著事件熱度消散而「斷崖式」坍塌，且大部分悼念是一次性的，只是滿足了「參與過」的心理需求（吳海榮等，2022）。正如一項對逝者 Myspace 的研究表明，哀悼者的評論頻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Brubaker & Hayes, 2011），本研究在一開始就發現對高彥的哀悼需要許多相關事件的刺激，一旦「事件鏈」停滯，公眾對於「玫瑰少年」和性少數問題的關注就會迅速抽離，因此這種哀悼模式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落差性。

其二，網絡哀悼既彰顯了民主性、包容性，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充滿權力和話語的衝突，圍繞性別平權主義的「網絡哀悼共同體」仍然需要直面中國主流價值觀念的「圍剿」，需要尋找一種相對溫和的話語模式來巧妙地迴避官方審查。更顯著的是，網絡哀悼中會出現「道德辯論」，這種悼念模式也為惡意話語提供沃土，因為網絡匿名性給了人們冷漠判斷的理由（Walter, 2015）。就像社交媒體中哀悼「玫瑰少年」時，仍然存在部分平權主義的反對者，他們運用儒家文化傳統中「一致性規範」（norm conformity）的價值標準與平權主義的支持者展開辯論，甚至可以借助社交媒體編造關於逝者的流言蜚語，從而進行公開化的污名和羞辱，營造一種「壞的死亡」（bad death）（Guy & Holloway, 2007）印象，會對性少數者的親人朋友帶來「二次傷害」。比如，有一些網友在社交媒體上散布傳言，聲稱「高彥家裏人重男輕女，他姐姐輟學打工供他上學，他到處遊玩穿名牌」，試圖挑起性別對立，從而消解「高彥事件」推動性少數群體權利關注的合理性。

## 結論與局限

本研究聚焦中國性少數平權行動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玫瑰少年」議題，通過大數據挖掘技術和批評性話語分析，勾勒了中國社交媒體哀悼空間中的話語實踐和權力博弈。在理論意義上，本研究在先前關於網絡哀悼的情感表達、持續聯結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賦權理論，剖析了情緒表達與持續聯結兩種哀悼話語之間關係，提出了「網絡哀悼共同體」概念，將網絡哀悼的賦權效應概括為「記憶賦權」、「符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賦權」。分析發現：(1) 網絡哀悼可被視作情緒宣洩的獨白與持續聯結的對話兩種模式；(2) 社交媒體哀悼中的持續聯結的動力機制在於集體記憶和身分認同；(3) 持續聯結過程中可能存在諸多矛盾，滲透著圍繞死亡、自殺、同性戀的權力博弈，讓逝者的社交媒體帳號成為充滿衝突的數字墓地；(4) 通過持續聯結式的話語實踐與權力博弈，逝者的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相互交匯，形塑出極具悲情色彩的象徵符號。而在現實意義上，本研究結合了中國文化語境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網絡哀悼過程中浸潤著鮮明的傳統文化觀念，體現了「視死如生」的中國特色生死觀。此外，本研究運用「公開性－可見性」的二維框架，拓展了網絡哀悼對於性少數群體的賦權效應研究，並反思了網絡哀悼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包括網絡哀悼賦權中「一次性參與」和道德責難等新問題。

本研究以玫瑰少年高彥的社交媒體哀悼為個案，拓展互聯網賦權層面的網絡哀悼研究，也僅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嘗試，仍存在一些局限。在研究方法層面，本研究採取了STM主題模型方法，儘管研究者們經過多輪算法測算和關鍵詞調試，但在操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主觀性。在數據分析層面，由於該事件調查進展的停滯，文本並未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狀態，因而本研究難以捕捉動態的權力博弈過程，只能在網絡哀悼的社會實踐部分結合中國社會的文化與政治語境展開權力博弈的分析。在研究對象層面，本研究並沒有廣泛關照社交媒體上對該事件的公開哀悼與紀念，而這一部分內容可能會涉及更多的圍繞性少數平權議題的公共討論，或許會提供更多的關於「社交媒體如何賦權中國性少數群體」的思考。此外，本研究為了更加聚焦探討網絡哀悼話題，僅選擇了「高彥事件」這一新近案例，後續研究可以對「玫瑰少年」的系列事件進行綜合性梳理和探索，從而更加深入地探討社交媒體中「玫瑰少年」議題與中國性少數平權行動之間的理論聯繫。

## 註釋

1 出於名譽權考量，本文將涉及「高彥事件」的大學(學院)化名為「X大學」。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伊萊恩·卡斯凱特 (2020)。《網上遺產：被數字時代重新定義的死亡、記憶與愛》(張淼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原書Kasket, E. [2019]. *All the ghosts in the machine: Illusions of immortality in the digital age*. Robinson.)
- Yilaien Kasikaite (2020). *Wangshang yichan: Bei shuzi shidai chongxin dingyi de siwang, jiyi, yu ai* (Zhang Miao, Trans.). Fuzhou: Haixia wenyi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asket, E. [2019]. *All the ghosts in the machine: Illusions of immortality in the digital age*. Robinson.)
- 李平菊 (2021)。〈中國火葬制度的困境之源〉。《湖北社會科學》，第10期，頁46-53。
- Li Pingju (2021). *Zhongguo huozang zhidu de kunjing zhi yuan*. *Hubei shehui kexue*, 10, 46-53.
- 吳海榮、趙天照、伍藝濤 (2022)。〈媒介准入與象徵哀悼：數字時代集體悼念的儀式與情感〉。《青年記者》，第14期，頁51-53。
- Wu Hairong, Zhao Tianzhao, Wu Yitao (2022). *Meijie zhunru yu xiangzheng aidao: Shuzi shidai jiti daonian de yishi yu qinggan*. *Qingnian jizhe*, 14, 51-53.
- 何晶 (2021)。〈「底層表達」視角下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路徑創新〉。《新聞大學》，第1期，頁48-58。
- He Jing (2021). “Diceng biaoda” shijiao xia Zhongguo zhengzhi chuanbo yanjiu de lujing chuanguan. *Xinwen daxue*, 1, 48-58.
- 周裕瓊、張夢園 (2022)。〈數字公墓作為一種情動媒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2期，頁32-52。
- Zhou Yuqiong, Zhang Mengyuan (2022). *Shuzi gongmu zuowei yizhong qingdong meijie*.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2, 32-52.
- 周裕瓊、張夢園 (2023)。〈未知死，焉知生：過程性視角下的死亡與傳播〉。《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2期，頁1-10。
- Zhou Yuqiong, Zhang Mengyuan (2023). *Weizhisi, yanzhisheng: Guochengxing shijiao xia de siwang yu chuanbo*.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2, 1-10.
- 周葆華、鍾媛 (2021)。〈「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社交媒體、集體悼念與延展性情感空間——以李文亮微博評論(2020-2021)為例的計算傳播分析〉。《國際新聞界》，第3期，頁79-10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Zhou Baohua, Zhong Yuan (2021). "Chuntian de huakai qiutian de feng": Shejiao meiti, jiti daonian yu yanzhanxing qinggan kongjian—Yi Li Wenliang Weibo pinglun (2020–2021) weili de jisuan chuanbo fenxi. *Guoji xinwenjie*, 3, 79–106.
- 姜紅、胡安琪、方俠旋 (2022)。〈生死界面：與逝者的數字「交往」〉。《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2期，頁69–103。
- Jiang Hong, Hu Anqi, Fang Xiakuan (2022). Shengsi jiemian: Yu shizhe de shuzi "jiaowang." *Chuanbo yu shehuixuekan*, 62, 69–103.
- 陸新蕾 (2014)。《從話語再現到身分抗爭：大眾媒介與中國同性戀社群的互動研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論文。
- Lu Xinlei (2014). *Cong huayu zaixian dao shenfen kangzheng: Dazhong meijie yu Zhongguo tongxinglian shequn de hudong yanjiu*. Fudan daxue xinwen xueyuan boshi lunwen.
- 高嘉遙、蔣璐璐 (2021)。〈聯結、交互和展演：數字遺產的媒介化生存〉。《當代傳播》，第5期，頁109–112。
- Gao Jiayao, Jiang Lulu (2021). Lianjie, jiaohu he zhanyan: Shuzi yichan de meijiehua shengcun. *Dangdai chuanbo*, 5, 109–112.
- 章戈浩 (2020)。〈傳播與媒介研究的死亡盲點：一個生存媒介研究的視角〉。《全球傳媒學刊》，第2期，頁21–34。
- Zhang Gehao (2020). Chuanbo yu meijie yanjiu de siwang mangdian: Yige shengcun meijie yanjiu de shijiao.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2, 21–34.
- 張信勇 (2015)。〈LIWC：一種基於語詞計量的文本分析工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101–104。
- Zhang Xinyong (2015). LIWC: Yizhong jiyu yuci jiliang de wenben fenxi gongju.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ban)*, 4, 101–104.
- 許瑩琪、董晨宇 (2019)。〈社交媒體中的哀悼行為與社會規範〉。《新聞與寫作》，第11期，頁49–54。
- Xu Yingqi, Dong Chenyu (2019). Shejiao meiti zhong de aidao xingwei yu shehui guifan. *Xinwen yu xiezuo*, 11, 49–54.
- 斯拉沃熱·齊澤克 (2016)。《事件》(王師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原書 Zizek, S. [2014]. *Event: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 concept*. Melville House.)
- Silawore Qizeke (2014). *Shijian* (Wang Sh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Zizek, S. [2014]. *Event: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 concept*. Melville House.)
- 鄒振東 (2018)。《弱傳播：輿論世界的哲學》。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Zou Zhendong (2018). *Ruochuanbo: Yulun shijie de zhexue*. Beijing: Guojia xingzheng xueyuan chubanshe.

喻國明、馬慧 (2016)。〈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範式：「關係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係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國際新聞界》，第10期，頁6–27。

Yu Guoming, Ma Hui (2016). *Hulianwang shidai de xinquanli fanshi: “Guanxi fuquan” — “Lianjie yiqie” changjing xia de shehui guanxi de chongzu yu quanli geju de bianqian*. *Guoji xinwenjie*, 10, 6–27.

曾慶香 (2021)。〈新媒體語境下的輿論外交：弱者傳播與數據新聞〉。《社會科學》，第4期，頁173–180。

Zeng Qingxiang (2021). *Xinmeiti yujing xia de yulun waijiao: Ruozhe chuanbo yu shuju xinwen*. *Shehui kexue*, 4, 173–180.

開薪悅、姜紅 (2019)。〈從「個人抗暴」到「俠客復仇」：原型視野下的公眾輿論——以「昆山反殺案」為中心的研究〉。《新聞記者》，第4期，頁4–14。

Kai Xinyue, Jiang Hong (2019). *Cong “geren kangbao” dao “xiake fuchou”: Yuanxing shiye xia de gongzhong yulun—Yi “Kunshan fansha an” wei zhongxin de yanjiu*. *Xinwen jizhe*, 4, 4–14.

熊偉 (2011)。《話語偏見的跨文化分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Xiong Wei (2011). *Huayu pianjian de kuawenhua fenxi*. Wuhan: Wuhan daxue chubanshe.

蔡騏、趙嘉悅 (2022)。〈作為標籤與規訓的隱喻——對網絡流行語「社恐」的批判性話語分析〉。《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9期，頁138–145。

Cai Qi, Zhao Jiayue (2022). *Zuwei biaoqian yu guixun de yinyu—Dui wangluo liuxingyu “shekong” de pipanxing huayu fenxi*.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9, 138–145.

潘忠黨、劉於思 (2017)。〈以何為「新」？「新媒體」話語中的權力陷阱與研究者的理論自省——潘忠黨教授訪談錄〉。《新聞與傳播評論》，第1期，頁2–19。

Pan Zhongdang, Liu Yusi (2017). *Yi he wei “xin”? “Xinmeiti” huayu zhong de quanli xianjing yu yanjiuzhe de lilun zixing—Pan Zhongdang jiaoshou fangtanlu*. *Xinwen yu chuanbo pinglun*, 1, 2–19.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2008)。《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孫宏哲、張聚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Faust, D. G. [2008].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70 期 (2024)

Delu Jierping Fusite (2008). *Zhe shouan de guodu: Siwang yu Meiguo Neizhan* (Sun Hongzhe, Zhang Juguo,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aust, D. G. [2008].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michai-Hamburger, Y., Mckenna, K., & Tal, S. A. (2008). E-empowerment: Empowerment by the interne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5), 1776–1789.
- Andersson, Y. (2019). Blogs and the art of dying: Blogging with, and about, severe cancer in late modern Swedish society.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9(4), 94–413.
- Bell, C. M. (1997).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ngaman, J. (2020). “Dud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towards a celebrity death”: Parasocial grieving and the collective mourning of Kobe Bryant on Reddit.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86(2), 364–381.
- Brubaker, J. R., & Hayes, G. R. (2011, March).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onlin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ost-mortem Myspace com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ACM 2011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hina*, 123–132.
- Carroll, B., & Landry, K. (2010). Logging on and letting out: Us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o grieve and to mourn.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5), 341–349.
- Chan, C. (2012). *Marketing death: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a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ung, S., & Cho, H. (2017). Fostering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celebrities on social media: Implications for celebrity endorsement. *Psychology & Marketing*, 34(4), 481–495.
- Dilmac, A. (2018). The new forms of mourning: Loss and exhibition of the death on the internet.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7(3), 280–295.
- Doka, K. J. (1999). Disenfranchised grief. *Bereavement Care*, 18(3), 37–39.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Polity Press.
- Gamba, F. (2018). Coping with loss: Mapping digital rituals for the expression of g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33(1), 78–84.
- García-Gavilanes, R., Mollgaard, A., Tsvetkova, M., & Yasseri, T. (2017). The memory remains: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 *Science Advances*, 3(4), e1602368.
- Graham, C., Gibbs, M., & Aceti, L. (2013).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death, afterlife, and immortality of bodies and dat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9(3), 133–141.

- Guy, P., & Holloway, M. (2007). Drug-related deaths and the special deaths of late modernity. *Sociology*, 41(1), 83–96.
- Holst-Warhaft, G. (2000). *The cue for passion: Grief and its political u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en, M. H. (2016). “Spectacular death”—Proposing a new fifth phase to Philippe Ariès’s admirable history of death. *Humanities*, 5(2), 19.
- Jovchelovitch, S. (2012). Narrative, memor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46(4), 440–456.
- Kasket, E. (2012). Continuing bonds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ing: Facebook as a modern-day medium. *Bereavement Care*, 31(2), 62–69.
- Kern, R., Forman, A. E., & Gil-Egui, G. (2013). R.I.P.: Remain in perpetuity. Facebook memorial page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0(1), 2–10.
- Klass, D., Silverman, P. R., & Nickman, S. (1996).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Taylor & Francis.
- Kuhn, K. D. (2018). Using structural topic modeling to identify latent topics and trends in aviation incident report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Emerging Technologies*, 87, 105–122.
- Lagerkvist, A. (2017). Existential media: Toward a theorization of digital thrownness. *New Media & Society*, 19(1), 96–110.
- Li, C., & Zhang, X. Y. (2017, September 1). *Online regulations and LGBT rights: A test for China’s legal system*.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online-regulations-and-lgbt-rights-a-test-for-chinas-legal-system/>.
- Lin, S. (2020, August 29). *How China’s reality show roses lost their thorns*. Sixth Tone.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6103>.
- Lucas, C., Nielsen, R., Roberts, M., Stewart, B. M., Storer, A. & Tingley, D. (2015). Computer-assisted text analysis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23(2), 254–277.
- Marwick, A., & Nicole, B. E. (2012). “There isn’t Wifi in heaven!” Negotiating visibility on Facebook memorial pag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6(3), 378–400.
- Miao, W. S., & Chan, L. S. (2023). Revisiting community and media: An affordance analysis of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used by gay commun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3(3), 210–221.
- Nansen, B., Arnold, M., Gibbs, M., & Kohn, T. (2015). The restless dead in the digital cemetery. In M. Christopher, A. Moreman, & D. Lewis (Eds.), *Digital death: Mortality and beyond in the online age* (pp. 111–112). Praeger.
- Papailias, P. (2019). (Un)seeing dead refugee bodies: Mourning memes, spectropolitics, and the haunting of Europ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1(8), 1048–1068.
- Penney, J. (2015). Social media and symbolic action: Explor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Facebook red equal sign profile picture campaig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 52–66.

- Proust, V. (2023). By sharing our loss, we fight: Collective expressions of grief in the digital a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6(2), 393–403.
- Ren, X., & Gui, T. (2022). Where the rainbow rises: The strategic adaptations of China's LGBT NGOs to restricted civic 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3(145), 101–119.
- Roberts, M. E., Stewart, B. M., Tingley, D., Lucas, C., Luis, J. L., Gadarian, S. K., Albertson, B., & G. Rand, D. G. (2014). Structural topic models for open-ended survey respon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4), 1064–1082.
- Roberts, P. (2004).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Community in the virtual cemetery.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9(1), 57–76.
- Rofel, L. (2012). Grassroots activism: Non-normative sexual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n W. Sun, & Y. Guo (Eds.), *Unequ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inequality* (pp. 154–167). Routledge.
- Root, B. L., & Exline, J. J. (2014). The role of continuing bonds in coping with grief: Over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Death Studies*, 38(5), 1–8.
- Rothschild, J. E., Howat, A. J., Shafranek, R. M., & Busby, E. C. (2019). Pigeonholing partisans: Stereotypes of party supporters and partisan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41(2), 423–443.
- Sadan, E., & Churchman, A. (1997). Process-focused and product-focused community planning: Two variations of empower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32(1), 3–16.
- Shi, Z. Z., & Yang, G. B. (2016). New media empowerment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 In J. DeLisle, A. Goldstein, & G. Yang (Eds.),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 changing China* (pp. 71–8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tets, J. E., & Turner, J. H. (2006).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 Springer.
- Stolow, J. (2013). *Deus in machina, religion, technology and the things in-betwee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Sumiala, J. (2018). Deconstructing immortality? Identity work and the death of David Bowie in digital media. In Z. Papacharissi (Ed.), *A networked self and birth, life, death* (pp. 185–187). Routledge.
- Theall, D. F. (2001).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Vernon E. Jordan Law Library (2023, January 6). *A brief history of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ard University Law Library. <https://library.law.howard.edu/civilrightshistory>.
- Walter, T. (2015). New mourners, old mourners: Online memorial culture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ourning.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1(1–2), 10–24.

- Walter, T., Hourizi, R., Moncur, W., & Pitsillides, S. (2012). Does the Internet change how we die and mour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64(4), 275–302.
- Wei, N. (2022, October 12). *Shandong 'Rose Boy': Student's suicide sparks outrage over LGBTQ discrimin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The China Project. <http://thechinaproject.com/2022/10/12/shandong-rose-boy-lgbtq-discrimination-chinese-schools/>.
- Worden, J. W. (1991).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Springer.
- Yang, Y. F. (2019). 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The empowerment of Chinese sexual minorities/LGBT in the social media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118), 662–677.

## 本文引用格式

- 邵鵬、王晟、應恩挺 (2024)。〈網絡哀悼的賦權效應：社交媒體哀悼空間的話語實踐與權力博弈〉。《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70 期，頁 115–151。